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
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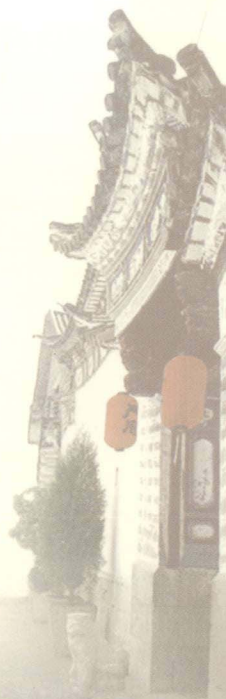


大理白族 喜洲商帮研究

陈延斌 / 著

DALI BAIZU
XIZHOU SHANGBANG
YANJIU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

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

陈延斌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陈延斌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1108-749-9

I. 大… II. 陈… III. 白族—商业史—研究—
大理市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730 号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

作 者 陈延斌

责任编辑 红 梅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8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749-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的兴起和发展	(11)
第一节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概况	(12)
第二节 从“河賧贾客”到“喜洲商帮”	(16)
第三节 喜洲商帮主要代表商号的发展脉络	(29)
第二章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土壤	(47)
第一节 地理自然条件是白族商帮形成和发展的 重要条件	(47)
第二节 白族商帮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70)
第三节 白族商帮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	(83)
第四节 白族文化与商帮的发展	(118)
第五节 喜洲商帮特点——兼与其他商人的分析比较	(138)
第三章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对白族社会、经济和 文化发展的影响	(159)
第一节 喜洲商帮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影响	(159)
第二节 喜洲商帮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170)
第三节 喜洲商帮对当地文化的影响	(183)
第四节 对喜洲商帮作用性质的认识	(192)
第四章 白族喜洲商帮与当代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207)
第一节 喜洲商帮的商业文明：今天和昨天对话	(207)
第二节 商业文明与文化相对论的意义	(221)
第三节 珍惜历史机遇，构建区域合作圈，面海兴邦	(225)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8)

绪 论

一、研究意义

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巩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中国多民族社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中国近代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必须建构在依托市场而兴起的生产及其从业者研究上。

中国多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特点之一，是地区与社会阶段变迁的多样性。地处边远的西南是最具特色的一个多民族地区，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不能不研究中国的西南多民族社会。中国西南多民族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发展历史，各民族商人在西南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各族商人的研究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社会发展，就不能不关注云南；要研究云南多民族社会发展，就不能不关注大理白族的历史与文化。

研究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大理白族这个在云南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民族。白族及其先民主要生活在洱海周围，这里历史上曾经是南诏和大理等几个民族地方政权中心地区。在这片土地上，除了主体民族白族以外，还分布着彝族、回族、汉族、藏族等多个民族，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云南的各个民族之中，白族借鉴、吸收汉族文化比较早，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与云南省内其他民族相比，白族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领先

位置。在新中国成立前，当大部分民族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白族地区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一定程度上而言，云南大理白族的社会经济变迁历程及其对整个云南的影响贯穿云南的近代发展历史。

白族主要居住在大理地区，这里地处滇西，东接四川，北上西藏，西通缅甸、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个商旅云集的交通枢纽。作为洱海西岸核心地区的喜洲，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繁盛的地区，以喜洲白族为主的民族工商业者群体喜洲商帮就诞生在这里。喜洲商帮的形成离不开洱海地区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离不开大理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洱海地区一直是西南交通枢纽。自秦汉以来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商队络绎不绝，南诏、大理国时代洱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冠于西南，自明以来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促进这一地区形成了颇具传统的商业交流活动。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河賧贾客”，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而商人逐渐走向历史的舞台。各族商人带动了整个滇西地区内部及与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使滇西成为近代云南商业经济发展最活跃、社会发展变化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喜洲在近代因商帮的兴起而达到发展的巅峰，从这里走出去的少数民族工商业者，成为推动近代云南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历史上曾经富甲三迤^①的喜洲商帮，其发展与消失与时代背景以及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白族文化传统对于商帮从业者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关联。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兴起以及近代市场体系的发展形成等问题的探讨。在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时候，学者们往往把注

^① “三迤”，道名，即迤西、迤东、迤南，清初在云南所设，习惯上将云南称“三迤”。

意力集中在以汉族资产阶级为主要构成的内地和沿海地区，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近代工商业资本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西南而言，云南大理白族喜洲商帮对于白族社会在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大理白族喜洲商帮为代表的一些少数民族工商业资本，不仅与汉族资产阶级一起构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而且像汉族资本一样对中国部分地区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大理白族喜洲商帮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了与其他商人群体的不同特点。无论是商帮民族构成、内部血缘关系等特点，还是企业生产经营组织上的差异，喜洲商帮活动都具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兴起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也将为近代商品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一个重要依据。

揭示喜洲商帮对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发掘历史上它曾经有的辉煌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对于今天包括白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把握，以民族地区为主战场的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云南等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问题，是我国多民族社会生活当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以白族商帮的发展历程为借鉴，在国家实现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缩小，抓住新时期重要的历史机遇，探索出一条切合西部民族地区实际的振兴之路，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和谐社会重中之重。构建地区多边自由贸易圈，不断巩固多区域合作机制，在未来建设经营云南出境经缅甸达印度洋的国家通道，是白族商帮发展史给予后人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新时期重要的历史机遇。面向印度洋是一个新的战略方向，云南在这个方向上具有优越的战略地

位。研究喜洲商帮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从经营管理层面上总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价值,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战略选择上构建大流域、大通道自由贸易区高度上谋划国家战略布局。

二、不同视角下的大理喜洲

关于喜洲商帮和喜洲的材料,较为翔实和具体地收入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即由朱家桢等前辈学者调查并整理的《大理县喜洲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和梁冠凡等学者调查并整理的《下关工商业调查报告》。研究喜洲商帮的学者,以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辈况浩林先生和喜洲商帮主要商号号主严子珍后人杨克成先生为代表。况浩林的《近代滇西白族商人严子珍创办的永昌祥商号》一文,系统地分析了白族商帮中最具影响力的永昌祥商号的形成发展脉络以及时代局限性及其现实意义。早年出国留学,后任云南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杨克成先生撰写的《永昌祥简史》一文,详细记述了永昌祥从建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历程,从经济数据分析的角度考察了永昌祥经营的特点。文中还叙述了半个多世纪大理喜洲的社会变化,文史价值很高。一些原来相关商号的高级雇员所撰写的文章和回忆录,也较为详细地反映了喜洲商帮重要商号的历史。如杨用勋等撰写的《云南近代工商企业家董澄农的创业里程》一文,对于研究白族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喜洲地方志中,也都记述了喜洲商帮的相关情况,如较早的版本是由杨宪典先生编纂的《喜洲志》(1988年版),俗称“小喜洲志”;由喜洲镇人民政府组织编修的《喜洲镇志》(2005年版)。

白族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民族,喜洲是大理白族经济文化核心区,民族特点浓郁,因此许多国内外学者都把这里作为

进行田野调查的地点。如人类学前辈许烺光 (Francis, L. K. Hsu) 的《在祖先的庇荫下——中国的血缘、性格和社会变迁》即是以大理西镇 (今天喜洲的一部分) 为田野点进行调查和创作的; 英国社会学学者费茨杰罗德·C. P. (Fitzgerald, C. P.) 在 19 世纪 20 年代, 在这里对白族进行了较为长期的田野考察, 写出了《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①之研究》一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海外学者涉足白族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 尤其美、日两国的女学者更是在喜洲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

有关喜洲的民族学文献主要以两种类型的田野调查为代表。一种是以许烺光为代表。他对喜洲先后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 着眼点放在了当地人的宗族、血缘、信仰等关系上, 通过对喜洲的社会结构、血缘组织、宗教文化和婚姻家庭的剖析, 进而到文化人格类型的归纳。在其《祖荫下: 中国的文化和人格》一书中, 他把喜洲作为一个微型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在许烺光笔下, 喜洲当地人被认为是汉族, 而不是少数民族——“民家人”(白族), 喜洲被作为中国西南村镇社会的分析对象。许烺光分析了当地文化对于家庭、宗教生活模式的特定参考意义, 进而指出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适用性; 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喜洲文化有着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完全相同的一些文化特征, 但却更加看重喜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共同之处。《祖荫下: 中国的文化和人格》获得了很多的赞誉, 学术界认为“本书达到了作者的三个目标。首先, 本书详细地描述了云南境内一个处于半农村状况的集镇……其次, 本书探讨了一个群体中个性性格形成的原动力。最后, 作者在很短的一章里阐述了喜洲镇内几种性格结构在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性……书中表达的观点对于发展文化和性格范畴内的研究

① “民家”族即白族。

非常有益。”^①“令人称羡地记述了一个敬祖几乎统治着镇内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集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社会体制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②但是，许烺光将喜洲作为中国人社会缩影，而对当地文化特色（少数民族）论述不足的方法论，却招致了利奇（Sir Edmund Leach）等人类学家的质疑与批评。

另外一种是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平等为实质的民族政策的实行，由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整理出版了《大理喜洲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这是一篇内容丰富的调查报告，不仅详细地记录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生产关系，还从历史角度对喜洲进行了追溯式研究，记述了喜洲的政治、家庭、婚姻、丧葬、节庆、禁忌、宗教、教育、卫生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为了解喜洲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与许烺光的方法不同，这次调查突出的是少数民族特色，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论。但在评价喜洲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作用时，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地强调了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而没能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

许多学者对于喜洲文化的研究多是在白族文化史、白族源流等课题项目下来进行的。从内容上看，涉及大理喜洲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喜洲古称“叶榆”、“大厘”等，是白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南诏、大理两个政权的核心地区。一些学者从民族史学的角度考察白族的源流，历史上建立的以喜洲所在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大理国，其中涉及了喜洲的历史文化变迁情况。白族研究大家如马曜、李纘绪先生在他们的多部论著中，不同程度地涉及

① 参见《美国人类学家》杂志评论，见《祖荫下》封底，1967年版。

② 参见《太平洋时事》杂志评论，参见《祖荫下》封底，1967年版。

喜洲。类似的成果还有：徐嘉瑞的《大理文化史稿》（1949年，1978年再版），方国瑜的《略论白族的形成》（1956），邵献书的《南诏和大理国》（1990）等。

2. 大理白族文化中受宗教影响的因素很多，具有民族特点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白族所独有的本主文化 [如杨政业的《白族本主文化论》（1994）、《白族本主传说故事》（1999）等]；另一个是佛教在白族地区的传播及发展 [如张锡禄著作《大理白族佛教密宗》（1999）等]。喜洲是大理白族聚居相对集中的地区，也是白族文化传统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以喜洲为调查地点，当代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及社会经济考察，内容既有对喜洲白族文化总体上的梳理，如李正清的《大理喜洲文化史考》（1998），郝翔、朱炳祥等人主编的《周城文化——中国白族名村的田野调查》（2001），杨育新的《大理喜洲风物》（2000）等，又有对于特色文化（民居、服饰、商帮等）的挖掘，如赵勤的《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1999）。

民族工商资本及商帮方面研究者长期偏重于徽商、晋商、陕商等内地商帮，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商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的研究也很少。以大理白族喜洲商帮为代表的云南各民族商人，不仅在中国西南边陲与内地间商贸交流关系的维系与发展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也是推动近代中印、中缅等国际交流发展的生力军。他们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领域，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近代社会特别是滇西社会变迁也曾有过一定的影响。

对于“由小到大，由近而远……与商界中得占一席，亦固其所，不得以逊于山西、闽粤之商贾，而忽视其所长也”^①的近代白族商帮，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史志

^① 杨范修：《云南商业史中之喜洲商帮》，载《大理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资料、民族调查、各地各民族的简史中都曾有过涉及，收集了不少的资料，梳理出了相当重要的发展线索。此外，一些前辈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如杨毓才先生的《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1989）、况浩林先生的《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1989）、杨聪先生的《大理经济发展史稿》（1986）等，以及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等校的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史专业的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都曾以近代大理地区的商人或商业经济状况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学位论文。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大理喜洲白族商帮的研究多数还停留在民族学描述分析和经济学考察上，白族商帮对于相关地区的经济拉动和影响，以及商人阶层的出现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内在联系类的问题，却少有具体深入的全面研究。

三、本研究切入点与创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商帮的经营活动、社会作用及其影响有着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就本书涉及的白族商人而言，他们的最初兴起是以传统商贸为主业，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近代也曾投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的实业，他们积极参与到地方实业的建设发展中，并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的积极作用。此外，这些白族商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尊崇传统的价值观、大家族思想。由于走南闯北的经商经历，他们大大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社会联系面，因而对于新文化、新事物吸收得快，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载体，影响着滇西社会的开化。总的来说，这些商人既有传统商人的一些印记，同时也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近代滇西社会变迁的影子。

本书利用民族理论、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

研究方法与手段，将商帮研究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当中，力图客观、真实地展现滇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社会变迁景象。就本书的新意而言，力图通过研究白族商帮的发展史，为国内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界在少数民族地区近代资本主义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例证。通过近代滇西白族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重新审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近代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对民族工商资本性质和作用的再认识，分析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而提出此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探求白族喜洲商帮与当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联系，针对今天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指出传统农业社会（以喜洲为代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本书所涉及的商人及其地理范围比较宽泛。滇西地区的白族商人除了喜洲籍白族外，尚有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鹤庆籍白族商人。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者，对于后者，将在书中论述喜洲商帮特点时加以对比分析。喜洲商帮名称的由来主要因为其商人，绝大多数是今天大理市喜洲镇辖区内的白族，故名“喜洲帮”。明清以后，由于喜洲商人经营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大理、下关、鹤庆、剑川、丽江等滇西、滇西北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影响很大，以至于“喜洲帮”这个名号也就是在丽江传开来的。^①近代四川、滇西、滇西北、西藏、缅甸等地市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联系密切，分工明显，供求关系息息相关的区域性整体，喜洲商人也正是在这个主要的阵地上驰骋。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本书中所指的地理范围不仅局限在喜洲一地，而是涵盖了滇西商人的主要据点大理、下关乃至省会昆明等地。

研究中的困难主要在于商帮材料的处理与再调查。我国 20

^① 李正清：《大理喜洲文化史考》，第 145 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年版。

世纪 50 年代民族调查后整理成的少数民族（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其中记载了一些有关喜洲商帮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尽全面。由于历史客观原因，当时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在对待喜洲商帮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强调较多的是其经济上的剥削性，较少涉及商帮对于地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作用的积极方面。此外被访对象大都已经离世，商帮后人有的已经移居海外，其他资料散佚等，也是调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因此在资料的搜集利用上，下了不少工夫，花费的时间较多。有鉴于此，我一方面利用假期调研，寻访健在的商界前辈或其后人，收集了一些口头资料；另一方面，仔细搜寻各地图书、回忆录、档案卷宗等资料，从北京到昆明，再到大理、喜洲等地，找到了不少难得的史料，使得对商帮的重要商号的研究能够深入。

第一章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的兴起和发展

1942年，著名作家老舍来到了云南大理喜洲镇，他在《滇行短记》中，这样描写了他眼中的滇西名镇：“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栏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喜洲镇在20世纪40年代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得益于喜洲商业在近代的发展以及一批少数民族富裕商人的出现，从而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从这里兴起并走向外部的白族工商业资本成为白族社会文化发展乃至影响云南工商业发展中一支重要力量——喜洲商帮。

喜洲人善于做生意，许多富户都是以经商起家，这既有历史背景也有客观因素。喜洲商帮的产生不仅与历史上喜洲作为洱海区域商贸中心及其处于滇西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联系，还与洱海地区悠久的历史经济发展历史等因素有关。这里的成年人大都从事商业，向外发展，奔走四方，由小而中，由中而大，屡兴屡仆。喜洲商帮的发展壮大与近代中国深刻的社会变化息息相关，有的人依靠勤劳节俭，机警灵活而达到小康，但要想发展成为巨商大贾，则与官僚资本联合，借助豪门势力，把握国际市场变化。与同一时期或同一地区其他商帮相比，喜洲商帮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

第一节 大理白族喜洲商帮概况

我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之地，有“文献名邦”之称。在元代前，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大理处于滇西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历来被兵家、商家及文人所倚重，是兵家、商家的必争之地，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唐与南诏之间的“天宝战争”就发生在这里。大理西经腾冲可达缅甸；北经丽江到西藏；东经昆明到广西南宁、广东广州、香港；内向南华到四川会理，沿长江至重庆、上海；南经临沧到南部的西双版纳，自古就是滇缅商道和滇藏商道的交汇点。至近代公路修通后，大理更成为滇西交通的重要枢纽。

白族是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洱海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白族历史悠久，富有创造才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灿烂的文化繁荣时期。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南诏、大理国时代就是白族文明史上绚烂的巅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白族及其先民在我国汉、唐、明、清及民国时期，在文化上都各有成就，其中就某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言，不乏空前的建树。从文明的领域而论，白族的商业文明就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喜洲镇位于今天大理市下关北35公里处，是汉代叶榆县城，南诏“大厘城”，文化积淀丰厚，这里的人重视文化教育，历来文商并重，今天更有着“四百教授一家乡”的美誉。早在南诏时，喜洲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重镇，古籍中所说“河賧贾客”指的主要就是从这一带走向四方的商人；近代对白族社会经济，乃至对云南产生重要影响的“喜洲商帮”即是从这里发祥的。今天，如果你探访喜洲镇，可以看到，在喜洲镇所属的各村中不同程度遗存下来的青瓦白墙，蔚为壮观的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就是“喜洲商帮”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缩影，更是白族建筑艺术杰作的展现。

由于在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大理又被誉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下关即是这个古都的重要窗口。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由我国蜀地经大理向西至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除了“蜀身毒道”，另外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由云南普洱至西藏拉萨、印度的“茶马古道”，也促进我国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大理一直是这两条古老商道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下关更是这两条向东南和南北方向延伸的古商道的交汇点，历来商贾云集。在唐代南诏、宋代大理国时期，大理是内地与缅甸、印度交通的重要驿站之一，成为中央王朝与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门户。大理下关从清代中叶开始，成了云南对外贸易的中心。各地各民族的商人在大理这个贸易中心地区从事商品交换，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最初的四川、临安（云南建水）、迤西（包括腾冲、鹤庆、喜洲等地）商帮并存的格局。商帮由原先四川、临安、迤西三帮格局，经激烈竞争、分化、瓦解、组合，四川、临安、昆明等帮相继退出，民国时期形成执进出口贸易大权的鹤庆、喜洲、腾冲三大商帮。三大商帮每帮均由三四十家大商号组成。鹤庆商帮以“福春恒（蒋宗汉）”号为代表，汉族、白族商人兼而有之，为本地帮；腾冲商帮以“洪盛祥（董洪）”号、“茂（王少岩）”号为代表，为外来汉帮；喜洲商帮以“永昌祥（严子珍）”号、“锡庆祥（董澄农）”号为代表，除几户回族商户外，几乎是纯白族商帮，为本地商帮。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内地各大城市纷纷沦陷，滇缅公路一度成了全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线，被称为“抗战输血管”、“抗日生命线”。各大商号纷纷抢运物资，形成“走印度、跑缅甸”的格局，下关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到1949年，下关发展成云南仅次于昆明的商贸经济中心，拥有大小商号2000余家。各大商